



軍事戰略

當前中共對外政策的實踐作為

助理教授 李明正

提

要

中共自1978年11屆三中全會後，國家戰略從以往政治掛帥轉向經濟發展，因應策略的調整，對外政策也從毛澤東時期的革命外交，轉向與周邊及國際合作，尋求良好關係的外交模式，各時期因國內外環境的改變而作技術性的調整。如鄧小平時期的睦鄰外交、江澤民時期的大國外交與當前胡錦濤強調國際責任的和諧世界論述。整體看來，中共改革開放後，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強，其外交政策的實踐也相形重要，本文將從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戰略與實踐作分析，以期更全面了解當前中共對外政策的實踐與影響。

壹、前言

近年來中共的崛起，已使得自身成為世界體系參與者、協調者、周邊秩序的務實塑造者，因應國際新角色所產生新的國際觀及政治佈局亦受到國際社會的注意。2003年年底，學者麥艾文(Evan S. Medeiros)和傅泰林(Fravel M. Taylor)刊登在美國《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之《中共新外交》(China's New Diplomacy)一文，開啟了探討中共新外交型態的研究風潮，全文深入分析了中共在國際政治面上對外關係態度上的調整，並列述相關之外交作為驗證其觀察。^{【註1】}

註1 Evan S. Medeiros and Fravel M. Taylor,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22-35.



當前中共對外政策，主要以開放改革為依據，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依循鄧小平對世界和平發展的觀察，從鄧小平獨立自主、和平發展與睦鄰外交、江澤民的大國外交與新安全觀到胡錦濤的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每個時期的對外政策雖然因應當時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作調整，然而，仍不脫鄧小平所提出和平發展與經濟改革的政策原則。值得一提的，當前的國際局勢，相較於冷戰時期，軍事力量已不能全然涵蓋一國的影響力。而是須通過包括軍事在內，把國內的道德、知識、科學、藝術、經濟、文化等成果向他國投射而獲得一種理想的國際形象。【註2】

此發展使得中共在對外政策上，不論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領域，皆一改以往對抗孤立的態度，轉而採取合作與參與的方式進行與各國的交往。在綜合國力不斷上升的清況下，中共在國際事務影響力也日益的提升，對外政策也日漸吸引國際社會的注意。許多學者皆認為，當前中共對外政策的制定，似乎深受傳統中國戰略文化的影響。【註3】如近年所提出和諧世界，就充滿傳統中國式的國際思維。本章將分別就中共對外的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戰略與實踐作分析，以期更全面了解當前中共對外政策的實踐與影響。

貳、中共對外的政治戰略與實踐

開放改革以來，中共國力快速上升，致使世界政治觀產生改變，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當前中共對外的政治戰略，大致承襲鄧小平對世界和平發展的觀察，在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下，發展夥伴外交，並在和諧世界的觀點下承擔大國的國際責任，以提升自身的國際政治地位及影響。相較於開放改革前，中共在對外關係上堅持意識形態至上和全面抗衡現行國際秩序的方針，所以對於國際機制和多邊主義大都抱持懷疑、抵制、批判的態度。聯合國被視為兩個超級大國的鬥爭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組織被視為西方國家的鬥爭工具；世界軍控與裁軍條約被視為限制開發中國家的機制；甚至一些民間和平運動、人權論壇也被批判為資本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傳聲筒。並認為如果承認或加入這些由西方主導的機制，將喪失主權，國家安全也會受到威脅，甚至可能被西方和平演變。【註4】

相較於毛時期抗拒參與他所認為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國內外環境的改變，使

註2 Chas. W. Freeman Jr., *Arts of Power-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 41.

註3 Tiejun Zha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2 (Apr-Jun 2002), p. 73.

註4 蔡拓，〈和諧世界與中國對外戰略的轉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6卷第5期（2006年9月），頁55。



得當前中共除了接受現行的國際機制外，也擴大參與了國際社會的運作。1986年3月，中共總理趙紫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談到多邊外交問題。這是中共政府自改革開放後對多邊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全面的權威性闡述。他表示：「中國將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支援聯合國組織根據《聯合國憲章》精神所進行的各項工作，積極參加聯合國及其各專門機構開展的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活動。」【註5】

正如中共學者時殷弘的觀察，中共的世界政治觀已經部分地（當然只是並只應當是部分地）有如國際關係思想史上的「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既承認總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家間常見的利益歧異甚而利益對立，但是同時也理解到甚至強調與之並存的、有規範和雙贏或多贏的國際，跨國交往，認識到甚至強調世界政治中各國的那些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念和共同規範起著重要作用，並且應當起更大的作用。【註6】可以說，中共參與國際體系的實踐，是國內政治選擇的結果，也即中共願意接受國際體系的規範和影響，尋求在體系中發展的自主行為。中共選擇和平發展戰略，就是要彌合與國際體系要求的差距，通過和平與合作的方式化解由差異帶來的矛盾和問題，以避免對抗和敵對關係的產生。【註7】

尤其在冷戰結束後，中共在新安全觀的認知下，推動夥伴外交與大國外交，藉以深化與全球大國尤其是周邊國家的互動與合作，在國際關係中，「夥伴關係」是指國家間為尋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種合作關係。因此，夥伴關係國之間應該互不為敵，雙方具有共同的利益，各自都有為尋求這種共同利益而進行合作的願望，雙方能夠採取切實的措施發展相互關係。也就是說，這種夥伴關係是一種互不以對方為敵、平等的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尋求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保持並推進雙方關係發展的良好狀態。【註8】

近年來，中共對國家間夥伴關係體現出更為準確的把握，更具全球性，戰略視野更為寬廣，並將這種新型關係應用於國家聯盟。建立各種「合作夥伴關係」、「戰略夥伴關係」。【註9】當前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戰略協作關係」或「戰略合作關係」有巴西、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埃及、阿根廷、印尼、哈薩克斯坦、加拿大、西班牙、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國家。「全面合作」、「全面合作夥伴」或

註5 龐森，〈改革開放與中國的多邊外交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1期，頁45。

註6 時殷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戰略思想—意識形態基礎、根本戰略綱領和當今所遇挑戰〉，《江海學刊》，2009年第5期，頁10。

註7 朱立群，〈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實踐解釋模式〉，《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頁31。

註8 倪建民、陳子舜，〈中國國際戰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63。

註9 夏建平，〈認同與國際合作〉（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頁219。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包括法國、英國、日本、南韓、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智利、秘魯、孟加拉、斯里蘭卡、克羅埃西亞等國家。中共與國家聯盟的戰略合作也提升到新的水準，這包括率先與東協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與歐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與非洲統一組織(OAU)確立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等。【註10】中共幾乎與世界各大主要國家皆簽定夥伴關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也重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動，以保持與第三世界國家友好的關係。

以拉美地區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共與巴西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以來，中共相繼與委內瑞拉建立了「面向未來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與墨西哥、阿根廷和秘魯分別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與智利建立了「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中共還逐步參與拉美地區組織與機制。繼1991年和1993年成為美洲開發銀行、拉美一體化協會的觀察員之後，中共又於2004年成為拉美一體化協會、美洲國家組織和聯合國拉美經委會觀察員，此外還建立起與里約集團(The Rio Group)、南方共同市場(Sou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安第斯集團(Andean Group)的對話機制及與主要國家外長級的磋商機制，形成了一個多管道的、有機的溝通對話機制。2008年中共官方發表了《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檔》，成為中拉關係發展的綱領性檔，為中拉關係的全方位合作奠定了基礎。【註11】

另外，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共官方也提出要做「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並開始積極地從理念和實踐兩個層面建構這種新的國家身份。一方面，中共在理念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理念，宣示了中共對國際責任的理解認知和對建構未來世界的理想目標追求；另一方面，中共在實踐上積極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在國際安全、經貿、環境等領域主動承擔責任，在加強與已開發國家合作的同時，積極深化與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促進共同發展。這些理念和實踐都傳遞出了強烈的責任意識，表明中共正在努力轉變自己的國家身份，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相對的也為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作準備。【註12】

如對外援助就是中共官方發展對外友好關係與展現負責任大國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的對外援助主要有贈款、無息貸款、低息貸款、免債、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向國際多邊援助組織提供資金等形式。中共對外援助不僅包括資金援助，而且也包括各種實物援助，如在受援國援建各類基礎設施、提供成套設備和技術、派遣醫療

註10 安秀偉，〈試析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實施狀況與成效〉，《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2011年1月），頁81。

註11 于玉宏，〈冷戰後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地緣戰略分析〉，《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頁60。

註12 嚴雙伍、趙良英，〈機遇與挑戰：理性看待「中國責任論」〉，《江漢論壇》，2010年第11期，頁76。



隊和專家組、開辦培訓班、發放獎金等。【註13】

以人道援助為例，自2002年向阿富汗提供救援物資以來，中共已28次執行國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任務，共向22個受災國提供總價值超過9.5億元人民幣的帳篷、毛毯、藥品、醫療器械、食品、發電機等救援物資。2001年，由北京軍區工兵團官兵、武警總醫院醫護人員和中共地震局專家組成的中共國際救援隊，開始參與國際災難緊急救援行動，迄

今已8次赴受災國執行救援任務。2010年1月，中共國際救援隊和人民解放軍醫療防疫救護隊赴海地參與地震救援，執行人員搜救、緊急救護、衛生防疫等任務，累計救治當地傷病員6500人次。2010年9月，中共國際救援隊和人民解放軍醫療救援隊、直升機救援隊赴巴基斯坦執行人道主義救援任務，累計救治當地傷病員3.4萬人次，直升機投送物資60噸。【註14】中共多邊援外為開展多邊外交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還日益成為塑造中共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手段。整體而言，中共多邊援外為中共外交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註15】

中美關係在中共對外政治戰略中是屬於全球層次，中共體認到，美國全球戰略目標是維護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在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地位和利益。為了實現全球戰略，美國必須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面對全球化時代不斷增長的各種傳統的和非傳統的不安全因素，美國必須走與其他大國合作之路，通過國際機制與大國協調來維持對全球事務的管理，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和擴展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的霸權是有限度的，美國在維持東亞區域秩序乃至世界秩序時，需要來自中共的支援。同樣，中共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與世界經濟進一步融合，國家利益進一步拓展，有同美國進行合作的內在要求。目前中共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

表一 2003-2009年中共首腦出訪主權國家和地區地域分佈表

年 份	周邊 地區	歐洲 北美	西亞 北非	撒哈拉以 南非洲	拉丁 美洲	大洋洲	總計
2003	13	3	3	1	3	3	29
2004	13	22	5	8	4	0	52
2005	15	12	1	7	13	2	50
2006	12	14	3	12	3	3	47
2007	11	5	2	11	7	2	38
2008	14	5	12	6	6	1	44
2009	18	18	4	6	10	4	60
總計	96	82	30	51	46	15	320
地區總國家數	29	46	24	48	33	16	196
國均受訪次數	3.31	1.78	1.25	1.06	1.39	0.94	1.63

資料來源：劉長敏、黃建達，〈當代中國首腦出訪與周邊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1年第1期，頁62。

註13 吳傑偉，〈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援助研究〉，《東南亞研究》，2010年第1期，頁42。

註14 〈2010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社，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31/c_121252219_9.htm

註15 熊厚，〈中國對外多邊援助的理念與實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頁63。



中美「相互依賴」性空前增強。【註16】

換言之，中美之間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雖然中共仍被美國視為第一假想敵，然而在國際事務上卻需要中共支持與合作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此情勢下也給了中共扮演世界大國角色的機會，近年來，中共也在中美合作競爭的平衡中尋找大國角色的扮演機會，然而當前的時空條件，對中共來說，周邊區域仍是其主要的重點所在(如表一所示)。

在東北亞，中日關係與南北韓問題是中共的重點所在，中日關係在小泉時代，因教科書及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中日兩國在政治上衝突不斷。2006年10月，中日關係出現了日本前首相安倍の「破冰之旅」，安倍訪華的最大成果，是中日雙方同意建立兩國關係新的基本框架，即「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2007年4月，中共總理溫家寶的「融冰之旅」，實現了兩國領導人互訪，雙方確認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2008年5月，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訪日之旅」中日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2009年9月，主張中日友好的日本民主黨領導人鳩山上台，他主張建立中日韓共同體，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2010年6月，日本新首相菅直人上台，他在首次施政演說中也表示要深化同中共的戰略互惠關係，以此表明了中日雙方急欲改善政治關係的努力。

在南北韓的問題上，冷戰結束後，中共一改以往一面倒向北韓的政治立場，於1993年與南韓建交，並與北韓維持友好關係，對雙方採取等距外交的手段。其中中共與南韓雙方關係先後由最初為1998年的《面向21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2003年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直至2008年建立《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政治互動中愈加強化。胡錦濤表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雙方要不斷充實和拓展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內涵，推動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註17】

在東南亞地區，20世紀90代以來，中共先後與泰國、越南、印尼等國確立戰略夥伴關係。1997年12月16日，首次東協－中共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會議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首腦會晤聯合聲明》，確立了中共與東協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2002年，中共與東協各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和平解決爭議、共同維護地區穩定、開展南海合作達成共識。中共於2003年作為域外大國率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協建立了

註16 于玉宏，〈冷戰後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地緣戰略分析〉，頁61。

註17 張玉山，〈中韓關係的回顧與展望〉，《當代韓國》，2010年春季號，頁2。



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10+3」和「10+1」合作機制為雙方或多方雙方對話合作提供了平臺。【註18】

在中亞地區，中共是最早承認中亞五國獨立並同它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1991年12月27日，中共宣佈承認中亞五國獨立。1992年1月2-6日，中共先後與中亞五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91-1997年，中共與中亞各國領導人頻繁互訪，先後簽署一系列重要檔，為雙方建立睦鄰友好關係奠定了條約法律基礎。以1997年9月中共與哈薩克斯坦簽署兩國政府關於在石油天然氣領域合作的協定為標誌，中共對中亞的政策開始發生一些顯著的變化，其主要表現是較前明顯加強了與中亞國家在能源、經貿和安全領域的合作，鞏固並發展了「上海五國」機制框架下的對話與合作。2001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在雙邊和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同中亞國家加強睦鄰友好關係，發展在政治、經濟、軍事、安全、能源、交通和人文等各領域的合作，維護區域安全與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與繁榮。【註19】

在南亞地區，一方面中共繼續保持加強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不僅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在礦產能源領域擴大合作，還投資2億美元在瓜達爾港修建一條公路和一個港口。另一方面，鼓勵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平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積極發展對印度的關係。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 (Atal Behari Vajpayee) 訪華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印度首次承認西藏是中共領土的一部分，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掃除了障礙。此外中共還積極參與阿富汗重建，繼續保持同孟加拉、斯里蘭卡、汶萊、馬爾代夫等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註20】中共也透過參與南亞多邊組織與會議，意圖達到參與南亞進而影響南亞的目的。如2005年11月，第13屆南盟峰會原則同意接納中共為觀察員，2006年，中共正式取得南盟觀察員地位，並於2007年4月，由外交部長李肇星率團首次出席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第14屆南盟峰會。這是中共在南亞地區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突破，標誌著中共與南亞國家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意味著中共開始通過多邊和制度的途徑發展與南亞國家的關係。【註21】

當前中共對外政治戰略既希望通過制定和實施合作規則，在減少不確定性中為合作關係的穩定運行提供法理保證。一方面，中共加快了參與現有國際或區域性合作組織的步伐。迄今為止，中共參加了1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300多個國際公約，認真履行以聯合國體系為中心的國際合作制度所賦予的國際責任。另一方

註18 于玉宏，〈冷戰後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地緣戰略分析〉，頁59。

註19 柳豐華，〈中國在中亞間：政策的演變〉，《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7年第6期，頁64、67、69。

註20 于玉宏，〈冷戰後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地緣戰略分析〉，頁59。

註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國外交2008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244。



表二 中共參與區域合作的作為演變

期間	代表作為	對外的主要策略	身分
1991-1994	加入APEC 加入ARF	既有國際秩序緩和大國關係與強化周邊關係。 與東協國家建立地區安全機制。	主動參與者
1995-1998	參與APEC領導人會談 上海五國機制 力撐人民幣度過亞洲金融風暴 收回香港主權	加速國內經濟體制改革。 透過人民幣提升次霸權地位，並成為強勢通貨。 落實APEC茂物目標強化加入WTO的籌碼。 提出APEC方式抗衡美國的經濟共同體。	發展中國家之首自居
1999-2001	收回澳門主權 主辦APEC會議 主辦亞洲博覽論壇 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積極舉辦區域合作活動，建立大國形象。 提出《中國現代化報告》。 將區域合作範圍從經濟擴大至政治安全領域。 以WTO作為多邊經貿協商談判平台。 提出新安全觀。	企圖成為主導者
2002-2005	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與東協簽署框架協議 與港、澳簽署《緊密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 參與六方會談 參與EAS	積極建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聲稱由東協主導東亞區域合作。 參與反恐行動與展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 頒布《中國國防白皮書》。 推動《東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宣言》。	區域性大國
2006-2008	提出和諧世界、三鄰政策 推動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推動《東亞能源安全宿霧宣言》 次、微區域主義邊境合作戰略 提出和平鴿戰略 兩岸兩會恢復會談 積極參與20國集團(G20)	主導東亞門羅主義，排除美國因素。 推動10加6、10加3的合作模式。 簽署FTA或雙邊貿易與投資協議。 推動軍事戰略夥伴關係與聯合軍演。 建立和諧社會的國際觀。 透過EAS與日韓共商區域事務。 北京奧運中融合中國文化提升軟權力意識。 推動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與東南亞國家合作模式。 於G20會議中提高中共的負責任大國形象。	區域性大國邁入全球性大國

資料來源：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2期（2009年4月），頁20。

面宣導並建立了各個層次和各種類型的對話與合作機制。除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共一東協自由貿易區以外，還包括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等等。【註22】從冷戰結束以來，中共在不同時期參與區域合作，其身分定為也發生變化，從初期的主動參與者，中期以發展中國家之首自居並企圖成為主導者，進入21世紀後，近期中共以強化其區域大國的身分並期望從區域大國往全球性大國邁進(如表二所示)。

綜合言之，中共對外政治戰略，因國內外環境的不同而有所調整，在不同階段

註22 劉傳春，〈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合作思想的變化與延續〉，《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1期（2010年1月），頁38。



採取不同身分的定位，然而不變的是對外採取開放合作的立場。考量其國力，當前中共仍以周邊區域政治合作為主，期望在鞏固周邊的基礎上逐步邁向全球性大國之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參與的各種區域合作，其組織性質往往不只侷限在政治議題，以中共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外交手段為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成為多邊合作機制，增強上海合作組織的執行能力，並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在地區事務中發揮巨大作用，但又不願意不將上海合作組織的範圍過分擴大。其次是推動軍事合作，主要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內部的聯合軍事演習，表達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反對「三大勢力」的決心。再次是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與成員國就能源合作問題展開對話。最後是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下，與俄羅斯展開多層次，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註23】此種特徵也將於下文在經濟、安全與文化戰略議題的討論中顯現出來。

參、中共對外的經濟戰略與實踐

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國家戰略的發展，就是以經濟為中心，任何政治、軍事與文化戰略皆以配合經濟戰略為主軸，中共對外戰略自不例外。中共經濟戰略主要以開放改革為核心，藉以引進資本及西方先進人才及制度，作為提升經濟發展進程方式，逐步將中共從計劃經濟轉型為與世界接軌之市場型經濟，分階段邁向世界經濟大國之林。依據鄧小平對國際形勢及國家發展的重新定位，中共國家戰略發展產生了根本性變化。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提出「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同時把實現小康作為20世紀末的奮鬥目標，並提出今後20年「兩步走」的戰略步驟：前10年主要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10年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註24】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並且正式確立了完整「三步走」的戰略構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開發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註25】

註23 陳琨，〈論中俄上海合作組織政策相異的原因〉，《改革與開放》，2011年第4期（2011年2月），頁27。

註24 金樂琴，〈中國國家發展戰略：30年變遷及成效〉，《中共長春市委黨校學報》，總第112期（2008年10月），頁44。

註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6。



表一 南沙群島駐軍現狀

國家	佔領島礁	駐軍狀況
中共	永暑礁、美濟礁、渚碧礁、南熏礁、東門礁、赤瓜礁、華陽礁 7 個島礁	1988 年初，組織有關人員進駐永暑礁建立海洋觀測站，此後為了守衛和建設這些島礁，海軍建立了「南沙巡防區」，以定期輪換方式駐守。
臺灣	太平島	海岸巡防署在太平島設立了南沙指揮部，總兵力約 110 人，下轄的岸巡中隊戰時根據命令納入臺灣軍事作戰體系，遂行各項作戰和支援任務。
越南	南威島、鴻麻島等 29 個島礁	駐軍約 2 千人，指揮部設在南威島，目前，越南在南沙駐軍最多。
菲律賓	馬歡島、費信島、中業島、司令礁等 9 個島礁	1948 年開始，菲律賓多次組織「探險隊」、「遠征隊」於南沙群島進行偵察勘測活動。1970 年，派軍佔領島礁，現駐軍約 100 人，指揮部設在中業島。
馬來西亞	彈丸礁、光星仔礁、南海礁等 5 個礁灘	1970 年，馬來西亞開始於南沙群島南部海區進行鑽探活動。1977 年開始派艦船佔領南沙群島南部海區，現駐軍 120 多人，指揮部設在彈丸礁。

資料來源：〈南沙群島駐軍現狀〉，《大公報》，2009年3月7日，版A12。

1997年中共十五大對原來「三步走」戰略中長達50年的第三步戰略目標作了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新「三步走」發展戰略思想：「展望下世紀，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註26】}可以說，中共自確立經濟改革路線後，經濟發展已成為國家戰略發展的核心。

中共對外經濟戰略除了受內部因素的影響外，世界局勢的走勢也是影響的因素之一。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國際冷戰結束。阻礙經濟跨越國家邊界的政治障礙消除，經濟全球化高速發展，人類真正進入因經濟全球化而形成的整體世界歷史。受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一度使中共經濟發展充滿變數，然而，1992年年初，透過鄧小平的南巡，對中共持續經濟改革起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在排除經濟改革的疑慮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作為一種內在力量，要求中國大陸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主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註27】}

當前中共對外經濟戰略的主要思維為，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成為經濟全球化

註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

註27 劉傳春，〈新中國對外合作關係發展的歷史進程和經驗啟示〉，《長白學刊》，總第158期(2011年3月)，頁111。



的參與者，制度的制定者，而不是經濟全球化的反叛者。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世界發展的總的趨勢，是國家行為體無法拒之門外的客觀潮流。經濟全球化得主要表現世界經濟的資訊化、市場化、自由化是全球經濟的集中寫照。科技革命特別是近年來的資訊革命極大的加快了全球資訊的整合，世界真的變成了一個地球村，資訊技術加快了知識經濟資源在全球的快速傳播；世界經濟的市場化以及世界各個國家市場的一體化將「市場」這一個無形的手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應用於世界的各個角落；正是世界經濟的資訊化和市場化令世界經濟自由化成為現實。事實證明誰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贏得先機，率先在科技革命以及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時刻把握好了自身命運，推動了自身的科技資訊化和經濟市場化，誰就可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主導地位，為自身贏得主動，令自身收益。【註28】

以亞洲金融風暴為例，中共首次展現其經濟的實力，此次風暴也使中共確實感受到經濟手段所帶來非政治、軍事手段可以達到的國際影響力。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相較於歐美各國置身事外的態度，中共就顯得較為積極，其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舒緩了危機的惡化，也讓東南亞國家重新認識中共在此區域經濟的影響力。可以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中共、東協關係的一個轉捩點。金融危機的突然襲擊使得東協國家想要快速進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的梦想瞬間破滅；而中共此時的經濟政策，獲得了巨大的利益，除了達到抑制危機的進一步傳染對本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外，同時也獲得消除「中國威脅論」的戰略效果。可以說，中共在自身經濟面臨巨大壓力的條件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作法，大體改變了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原本認知。

此事件更強化中共經濟「走出去戰略」，進一步與區域或全球經濟接軌，2000年10月召開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5次全體會議上，在「中共中央關於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0個5年計畫的建議」中，江澤民首次明確提出「走出去戰略」，至此中共正式確立了「鼓勵中國大陸具有比較優勢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方針。【註29】中共「政府」不論是在政策上的鬆綁或是財政上的挹注，其主要目的皆是希望，透過「企業」走出去來提升中共國際地位的形象；與此同時，政府積極透過與世界各國建立雙邊、多邊的貿易協議，如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積極參與或組織區域性、全球性經貿組織，如參與WTO、組織東協加一、東協加三等方式，藉以提升國際地位，形塑中共是「負責任大國」之國際形象。【註30】

註28 史明俊，〈中國應對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戰略〉，《法治與社會》，2011年第6期，頁202。

註29 蕭芄連，〈中國『走出去』戰略與中國企業跨國投資關聯性研究〉，私立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7月），頁24。



2001年對中共經濟來說是個關鍵年，經過15年的談判，中共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標誌著中共經濟正式與世界完全接軌，也表明中共經濟開放改革將不會走回頭路。隨著中共「入世」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共與世界的關係正變得越來越密切。中共十七大指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中共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大陸。中共入世後，創造了對外貿易增速世界紀錄，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商品貿易貢獻國和第二大出口商品貿易貢獻國。2007年中共對外貿易額比1978年增長了105倍，佔GDP的比重大增至67%，佔世界貿易總額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註31】

21世紀以來，中共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海外投資也出現了迅速增長的趨勢。截至2008年，中共共有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在172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企業1.2萬多家，投資總額達1700億美元，成為新興的對外投資國；同期，每年中共出境人員總數已超過4000萬人次。【註32】令中共的經濟體也不斷快速增長，2004年超越義大利；2005年一舉超越法國、英國，成為僅次於美、日、德三國，全球第四大經濟體。至2008-2009年，在國際金融風暴、景氣低迷的環境中，中共仍能保持經濟的高成長，其GDP乃相繼超越德、日兩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共雖然被視為美國最大的挑戰者，然而，中共與美國是世界大國，又是經濟依存度最高的國家，雙方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早在2004年，美國就成為中共的最大交易夥伴。儘管雙邊存在貿易赤字的問題，但中美兩國彼此間的關係還算穩定。雙方會就經濟矛盾針對經貿議題進行過戰略經濟對話，這些有助於減少兩國間的誤解及彼此間的不信任。隨著兩國的關係加深，中美之間需要充實的雙邊模式與對話機制。因此，中美應從近期、中期、長期目標集中探討兩國合作議題。處理好中美雙邊關係是保持台海局勢穩定及東亞地區和平安全穩定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中美雙方能在戰略上達到某種共識、形成一個構架的話，將有利於整個亞太地區長久的和平穩定和發展，【註33】而經濟合作是一關鍵因素。

近年來，中共與周邊區域經濟聯繫更為緊密，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經濟聯繫日趨緊密，一體化發展是必然趨勢。據中共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共和南韓分別是日本第一、第三大出口交易夥伴，佔日本出口總額比重分別是18.9%和8.1%，而

註30 鄭又平、林彥志，〈中國「走出去戰略」之分析：跨世紀中國經濟的轉變〉，《展望與探索》，第6卷第8期（2008年8月），頁61。

註31 安秀偉，〈試析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實施狀況與成效〉，頁80。

註32 甄炳禧，〈新形勢下如何保護國家海外利益—西方國家保護海外利益的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國際問題研究》，2009年第6期，頁49-54。

註33 巴殿君，〈21世紀中美雙邊關係中的臺灣問題〉，《東北亞論壇》，第16卷第5期（2007年9月），頁71。



2004年為13.1%和7.8%。南韓是東北亞地區對區域內貿易依賴度最高的國家，繼2004年中共取代美國成為南韓的第一大交易夥伴之後，2009年中韓貿易額佔南韓貿易總額達到創歷史新高的20.5%，而1991年僅為2.9%；日本是南韓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三大出口對象國。2006年以來，日本和南韓分別是中共第三和第六大交易夥伴，2009年中日貿易額為2289億美元，南韓貿易額為1562億美元。【註34】

客觀環境的發展配合國家戰略的前提下，中共對東北亞經濟合作一直持正面的態度，其戰略思維是希望透過經濟的合作整合東北亞經濟潛能，除了將中共經濟影響力在此區域加以提升外，也能促進本身經濟的發展。關於中、日與南韓三國合作，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曾表示，亞洲已成為全球最具發展活力和前景的地區之一。中、日與南韓同為亞洲重要國家，加強三方合作不僅符合三國利益，也有利於亞洲乃至世界的繁榮與發展。我們要把握歷史機遇，不斷擴大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模式，豐富三國伙伴關係內涵，發揮中、日與南韓合作對東亞合作的促進作用，為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作出應有貢獻。【註35】

在東南亞地區，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共與東協之經濟交流更為緊密，根據統計，1997-2008年中共出口至東協諸國以及從東協進口的貿易額分別成長799%以及847%。中共從東協進口額已從1997年的124億美元成長至2008年的1169億美元，中共出口至東協部分也從1997年的127億美元，成長至2008年的1141億美元。中共對東協經濟的重要性在於貿易與投資，此趨勢在未來將繼續持續下去。【註36】

2009年10月，在第十二次中共與東協領導人會議(10+1)上，中共總理溫家寶提出要發揮中共—東協自貿區作用，舉辦中共—東協自貿區論壇，設立總規模100億美元的中共—東協投資合作基金。【註37】此舉可看出中共與東協在經濟合作上的緊密程度。2010年1月1日中共—東協自貿區的全面建成是雙方關係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也是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重大事件。自此，中共對東協平均進口稅率從9.8%降至1.0%，東協六個老成員國對中共的平均關稅從12.8%降至1.6%。據中共商務部統計，2010年1—11月雙邊貿易額達2630億美元，同比增長41%。目前，東協是中共第四大交易夥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中共是東協第三大交易夥伴。中共對東協投資達19.6億美元，累計為108億美元；東協對華投資也達到了50億美元，同比增長35%，增長勢頭強勁。【註38】

註34 馮興豔、江瑞平，〈東亞區域合作中的南北互動〉，《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2期，頁50。

註35 〈加強中日韓三方的合作 繼續推進六方會談進程〉，《文匯報》，2009年12月13日，版5。

註36 洪銘德、游智偉，〈中國東南亞外交之研究：從軟權力的角度分析〉，《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12期(2009年12月)，頁67。

註37 何穎，〈構建中國—東盟文化中心的幾點設想〉，《當代廣西》，2009年12月下半月號第24期，頁56。



在中亞地區，中共與中亞區域的經濟合作也趨於緊密發展。1992年，雙邊在建交之初，中共與五國的貿易額僅為4.6億美元。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以後，貿易額保持快速增長。2008年的貿易額已達308.2億美元，增長了近66倍。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中共與中亞五國雙邊貿易額為235.4億美元，與上年相比，下降了23.6%。2009年貿易額下降主要是受到市場需求和價格下降因素的影響，中共與中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的趨勢並沒有改變。2009年，中共自中亞國家進口原材料商品數量有較大增長，中共在中亞各國外貿中的份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中共在中亞各國貿易排名進一步提前，中共已分別成為哈、烏、吉、塔的第二大交易夥伴，土庫曼的第四大交易夥伴。2010年1-4月中共與中亞國家貿易額已出現大幅回升，達到87億美元，增長26%。【註39】

在南亞地區，隨著雙邊關係的發展，中共與南亞經貿合作也在不斷深化，雙邊貿易增長強勁。據中共商務部統計，2008年中共與南亞8國的雙邊貿易總額已經達到661億美元，相比2000年增長了近12倍。【註40】2010年至10月止，中共與南亞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就實現了877.01億美元，超過了2009年全年的貿易總額，也比2009年同期增長48.5%，實現了高速增長。其中與孟加拉、尼泊爾、馬爾代夫3國的進出口增長率都在50%以上，與尼泊爾和馬爾地夫間的進出口增長率更是高達70%以上。【註41】但就目前而言。雙邊的貿易總量和經濟合作水準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還具有很大的潛力。

當前區域一體化的趨勢加速發展，擴大了地區內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擱置、緩解了部分地區矛盾，為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了動力。當今，全球化不斷進展是同區域一體化的深化與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全球化為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動力和條件；一體化反過來又拓展了全球化的勢頭和前景。在歐洲，區域一體化已成為現實；在東亞，一體化進程已經開始；在拉美，新的聯合趨勢正在出現；在南亞，兩個大冤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在考慮建立南亞經濟共同體，這些都大大促進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註42】

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也是中共對外經濟戰略的重要一環，目前中共已經簽署和正在談判自由貿易區(FTA)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看，除了部分重要能源資源生產國

註38 馮興豔、江瑞平，〈東亞區域合作中的南北互動〉，頁48。

註39 凌激，〈中國與中亞國家經貿合作現狀、問題及建議〉，《國際觀察》，2010年第5期，頁18。

註40 袁群、安曉敏，〈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現狀、問題與前景〉，《經濟問題探》，2010年第10期，頁166。

註41 俞文嵐，〈2010年南亞政治經濟發展概述〉，《東南亞南亞研究》，2011年第1期，頁13。

註42 李杏紅、任啟民，〈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和區域一體化的周邊戰略〉，《和平與發展季刊》，2005年第3期，頁15。



表三 截至2010年9月中共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情況

地區	名稱	狀況
亞太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1991年加入
東亞	內地與港、澳CEPA	2003年簽署；2004年1月1日實施
	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	2002年簽署協定；2004年實施早期收穫計畫；2005年實施《貨物貿易協定》；2007年1月簽署《服務貿易協定》；2010年基本建成
	《中共-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2008年10月23日簽署
南亞	《中共-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	2005年6月簽署《早期收穫協定》；2006年1月1日實施該協議；2006年11月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2月21日簽署《服務貿易協定》
中亞	上海合作組織	2001年加入；2004年通過《〈多邊經貿合作綱要〉落實措施計畫》
拉美	《中共-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2005年11月簽署，2006年10月實施；2008年4月簽署《服務貿易協定》
	《中共-秘魯自由貿易協定》	2009年4月28日簽署
	《中共-哥斯大黎加自由貿易協定》	2010年4月8日簽署
大洋洲	《中共-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2008年4月7日簽署

資料來源：華曉紅、莊芮、楊立強，〈中國參與周邊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踐與策略〉，頁83。

以外，有17個是周邊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此外，中共還正在與印度、南韓等進行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雙邊可行性研究。顯然，首先發展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並以此為基礎，逐漸建立中共的區域經濟合作網(如表三所示)，成為中共自由貿易區戰略的核心。【註43】

未來，中共在經濟的整合與合作，大致仍以周邊區域為核心，尤其是與東協之間的合作發展勢必更為緊密，從經濟戰略的規劃上，中共對亞洲區域整合基本目標仍是以與東協為主，未來在規劃建構經濟共同體時，可能仍會以將成立的「東協共同體」為核心，以「東協+1(中共)」合作機制為第1外圍，以「東協+3(中日韓)」合作機制為第2外圍，再以「東協+6」(「東協+3」再加上澳洲、紐西蘭和印度)合作機制為第3外圍，來建構亞洲區域整合的「同心圓」。唯在東協國家中仍有部分國家主張以美國制衡中共在此區域之發展，中共未來如何加強與東協國家之互信及合作，以排除美國介入中共所規劃的亞洲區域整合計畫，深值關注。【註44】

註43 華曉紅、莊芮、楊立強，〈中國參與周邊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踐與策略〉，《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2期(2011年3月)，頁82。

註44 陸委會企劃處，〈胡錦濤馬來西亞、新加坡之行的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09年第12期(2009年12月)，頁4。



肆、中共對外的安全戰略與實踐

所謂「安全」是強調國家主權、生存等目標的概念，傳統安全領域大都集中在國家生存的想像上，在冷戰時期主要以軍事安全為考量，並結合外交政治等傳統國家安全為內容，所涉及的安全議題包括軍事力量的威脅、武器的使用和控制方面。尤其冷戰時期以軍事和意識型態為主體的兩極對抗，已逐漸為後冷戰時期趨向多元化的既競爭又合作的機制所取代，首當其衝的是，全球化下的國家新主權觀已不再是傳統所認定應具有絕對性和不可分割性的主權觀。^{【註45】}面對國際局勢的新發展，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也在1993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針對安全概念指出：「安全概念必須改變，由單獨強調國家安全轉向更多強調人的安全，由通過軍備實現安全轉向通過人類發展實現安全，由領土安全轉向食物、就業和環境安全。」^{【註46】}重新定義安全概念。

在全球化的議題不斷發展之下，對於國家安全的挑戰除了領土、邊境、種族等矛盾所引起的衝突和戰爭，諸如此類所謂的傳統安全外，非傳統安全的影響亦在日益增加之中。除了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威脅之外，毒品走私、跨國犯罪、金融危機、傳染性疾病、非法移民、能源安全、環境污染等問題都是立即且明顯的挑戰，由於問題已跨越國界，於是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安全逐漸成為維護國際安全的有效途徑，而集體安全亦成了維護國際安全的最終目標。國際間對於安全的發展逐漸朝向非軍事層面的「綜合安全」、強調相互依賴的「共同安全」、以及各國相互合作方式面對安全問題的「合作安全」方向發展。^{【註47】}

可以說，隨著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不斷發展，相互依存的世界體系已逐步形成，安全狀態的建構與維持已超越國家層面而上升為地區性和全球性議題。國家間為了自身和地區整體安全而發展與加強合作，成為地區安全秩序的基礎。各國對安全合作模式的選擇，成為地區安全結構塑造的決定性因素。^{【註48】}因此，加強國際合作、共謀應對之道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近年來，世界各國透過發展雙邊或多邊安全合作，逐漸形成和建立了一些新型國際安全機制，促進了非傳統安全問題

註45 David Held,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David Held eds.,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197-235.

註4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47 吳英明、許文英，〈非政府組織（NGOs）在人類安全中的角色—多軌外交與全球民主安全〉，發表於《人類安全與21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台北：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2001年9月14日），頁96。

註48 李志斐，〈東亞安全：合作模式與結構〉，《當代亞太》，2010年第6期，頁104。



治理。【註49】當前各主要大國對安全環境的分析研判，不僅注重軍事、情報、社會穩定等傳統安全挑戰，而且越來越多地關注紛繁複雜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不僅注重強軍，而且強化經濟科技發展、資源環境維護與應對氣候變化。各大國調整安全戰略普遍更加重視國際經濟環境變化與自然災害等因素，力圖增強自身經濟與環境安全。【註50】

在此背景下，以「非傳統安全」為其特徵之新安全觀成為冷戰結束觀察國際社會的新視角，新安全觀主要認為安全是相互依賴的，它強調合作的重要性，重視集體安全與合作安全。新安全觀的合作模式既包括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又包括旨在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等。【註51】受此影響，中共有別冷戰時期對國際安全合作較為漠視的態度，冷戰結束後，以聯合國為主導作為強化國際安全合作的平臺。中共認為，作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是實踐多邊主義的最佳場所，是集體應對各種威脅和挑戰的有效平臺，應通過改革，使其朝向更有權威、效率和能力的方向發展，最終建立起以聯合國為核心，包括各種地區、跨地區、次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在內的全球集體安全機制。【註52】

在聯合國的基礎下，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周邊地區的多邊安全機制，中共體認到，在相互依存加深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純依靠自己的行動來獲得真正的安全，安全只能是相互的，各國都有權利和責任尋求建設性地解決安全問題，所有國家都有獲得安全的權利。【註53】而參與周邊多安全機制一方面，這一進程把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納入到地區制度框架之中，特別是這一制度建立在一系列新的安全和政治理念中，這無疑有利於鞏固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面，中共在這一進程中宣導的原則、建構的機制、積累的經驗隨著地區多邊主義的擴大，完全可以推動全球層次上的多邊主義的發展，【註54】正符合當前中共對外的戰略利益。

尤其面對美國的戰略圍堵，近年，美國在穩固東亞戰略局勢的戰略盤算下，正研議將美、日、韓三邊對話機制朝向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The Security Institu-

註49 劉亞洲，〈把握國家安全形勢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戰略籌劃〉，《黨政幹部參考》，2010年第9期，頁43。

註50 陳向陽，〈對當前主要大國安全戰略調整的看法〉，《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12卷第3期(2010年9月)，頁21。

註51 陸忠偉，《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頁57。

註52 張陀生，〈中國的國際安全秩序觀：歷史的回顧與思考〉，《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頁94。

註53 韓莉，〈中國崛起與東北亞的安全戰略選擇〉，《延邊黨校學報》，第25卷第5期(2010年10月)，頁68。

註54 方長平，〈多邊主義與中國周邊安全戰略〉，《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5期，頁51。



tion of Northeast Asia)發展，以及建構美、日、澳三邊軍事安全合作進一步整合亞太聯盟體系，希望透過制度化的建構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同時遏制中共成為東亞地區的霸權國家。^{【註55】}中共如能參與周邊多邊安全機制，必能有效化解美國所給予的壓力，並引導此區域的發展，因此冷戰結束後，中共積極於參與東北亞、東南亞與中亞等地區的多邊安全機制。

在東北亞地區，1993年成立的「東北亞合作對話」是一個第二軌道(半官方或非官方性質)的多邊安全論壇，官員和學者共同參加，旨在增進相關各國的理解、信任與合作。2003年成立的北韓核問題六方會談則是專題性的政府間地區安全合作進程，它是第二次北韓核危機爆發後由中共促成的。儘管目前六方會談面臨著很大困難，但它仍不失為朝鮮半島危機管理的一個重要管道，美國在北韓問題上需要中共的支持與援助，而中共利用此會談，在北韓核議題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連帶也提升自身在東北亞的影響力。

在東南亞地區，東協區域論壇是東亞安全合作機制化推動最早也最具規模的組織。由東協國家所主導，試圖以自己為核心推動亞太地區安全合作，以提升自身在區域的影響力。1994年第一屆東協區域論壇召開。迄今它已涵蓋亞太地區幾乎所有重要國家，成為本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1994年，中共出席了東協區域論壇召開的首次部長會議，顯示出中共在地區安全事態中已擺脫過去那種孤立的、被動應對的狀態，體現出一種積極的自身定位。^{【註56】}另2005年成立的東亞峰會機制也是由東協倡議成立的，中共也參與其中，目前其成員已發展到包括東協、中、日、韓、印、澳、紐西蘭、美、俄等在內的18個國家。它們有助於促進地區穩定，也緩解了有關大國對東亞地區一體化的疑慮。

在中亞地區，2001年由中共主導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是實踐中共新安全觀的典範，目前該組織的功能已由安全（例如反恐）和政治合作向經濟等領域拓展，成為歐亞大陸腹心地帶有活力的一個區域組織。^{【註57】}中共在中亞的安全戰略，主要建立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架構下，與中亞國家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及建立的軍事合作及互信；在聯合反恐、打擊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方面，中共與中亞國家多次舉行反恐聯合軍演，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五周年宣言》、《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2007年至2009年合作綱要》及《關

註55 Sang-Jin Shin, "North Korea-China Rel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East Asian Review, vol. 17, no. 3 (September 2005), pp. 3-24.

註56 馬榮久，〈中國與東亞地區安全-以地區複合安全的過程導向為視角〉，《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0年第1期（總第103期），頁105。

註57 宋效峰，〈國際機制與和諧亞太建設〉，《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5期（2011年3月），頁3。



於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境內組織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程式協定》等十個綱領性的文件，為以後合作的進一步深化打下了基礎，【註58】對穩定中共西北邊境建立了正面的貢獻。

另外中共的安全戰略也反映在中共處理主權爭議的議題上，主權爭議一直都是中共對外關係最敏感的議題，唯有解決主權爭議，才能擁有穩定和平的周邊環境，為了確保周邊環境的穩定，目前，中共已與絕大多數鄰國簽署了陸地邊界劃分條約，陸地疆界基本穩定。中共與哈薩克斯坦1782公里的邊界線通過1994年《中哈邊界協議》、1997年《中哈國界補充協定》、1998年《中哈國界第二補充協定》及2002年《中哈國界線勘界議定書》已全部解決；中共與吉爾吉斯斯坦於2004年簽署《中吉國界線勘界議定書》，1096公里的邊界劃定已經完成；中共與塔吉克斯坦500公里的邊界線於2002年通過簽署《中塔國界的補充協定》已經解決；2004年中共與俄羅斯簽署的《中俄東段邊界補充協定》使中俄之間4300多公里長的邊界問題經過十餘年的談判終於解決；就連存在問題的中印東部邊界，自1993年9月中印兩國正式簽署《關於在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以來，也逐步向好的方向發展，目前中印邊界局勢比較穩定。海上疆界方面，2000年12月25日，中越正式簽署《中越關於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和《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2004年6月30日，在經過批准後，兩協定同時生效，至此，中越兩國終於解決了在北部灣劃界問題上雙方長期存在的爭議。【註59】

大體上，目前中共主權爭議尚有中印邊界、南海問題與釣魚臺等仍未解決，在此部分，中共採取「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方式處理。1984年2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進而提出，「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註60】在此原則下，通過簽署不使用武力解決的信任措施，尋求通過協商方式解決問題，或維持現狀，同時鼓勵各方共同建立信任措施，實施預防性外交。【註61】

以南海問題為例，中共與東南亞爭端國，透過東協區域論壇進行協商，東協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可以概括為：各方行為體必須遵守國際法和國際公約中

註58 封永平、姚志鵬，〈中亞地緣政治經濟博弈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上海商學院學報》，第10卷第6期（2009年11月），頁38。

註59 靖國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睦鄰外交〉，《經濟與社會發展》，第6卷第1期（2008年1月），頁48。

註60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9。

註61 周士新，〈試論中國對東盟的合作安全政策〉，《創新》，2010年第2期，頁7。



的相關準則；要求各方保持行為上的自我克制，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保持南海地區的航海自由。值得指出的是，東協區域論壇開始鼓勵與中共就南海問題進行高級對話，並著手制定南海行為準則。2002年11月4日，東協與中共在柬埔寨王國金邊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確認了雙方在南海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註62】

另外，近年來，中共對軍事外交著力甚深，軍事外交是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目標的一種重要手段，它與國家安全戰略緊密結合在一起，承擔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軍事外交中的活動形式多樣，主要通過軍事交流、國際維和、人道主義救援、軍事援助、聯合軍演，國際軍控等各種管道，推進世界各國軍隊交流與合作、瞭解與信任。【註63】作為國家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外交在國家外交戰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中共學者楊松河認為：「軍事外交是代表國家軍事安全利益或國家集團安全利益，以軍隊為主體、以軍事為主要內容的涉外活動。」軍事外交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政治、外交和軍事戰略，為實現國家的外交和軍事戰略目標服務。【註64】

據統計，1980年以前中共對外軍事交往的互訪次數僅百餘次之多。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在對外軍事交往中逐步超越了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準和地理位置的限制，發展出軍事外交一個嶄新的時期。【註65】尤其在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從以往以軍事對抗為特徵之兩極格局轉變為以經濟交流之多元互動形式，更突顯出軍事外交的重要性。1998年7月中共公佈的第一部國防白皮書《中國的國防》，首次在對外公開的官方報告中提出要發展全方位、多層次的軍事外交。【註66】標誌著中共正式將軍事外交提上對外政策的議程上。而2004年頒布的中共國防白皮書，首次將對外軍事交流與合作列入中共的國防政策，並提出了與周邊國家開展軍事交流合作的「睦鄰、安鄰、富鄰」政策，推動中共與周邊國家軍事關係不斷深入。「請進來」聯訓之舉，則是標誌著中共與周邊國家的軍事交流合作邁開了實質步伐。【註67】

當前中共的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的現代化水準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引進外援，學習外軍的先進經驗，特別是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為中共國防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之一，藉此使中共能迅速擺脫落後局面，是實現軍事現代化的有效途徑。【註68】如在航空工業領域與俄羅斯的合作，拓展了中共航

註62 餘建軍，〈美國和東盟地區論壇—多邊主義的視角〉，《東南亞研究》，2009第1期，頁60。

註63 韓壯壯，〈軍事軟實力與軍事外交〉，《學理論》，2009年第24期，頁26。

註64 楊松河，〈軍事外交概論〉（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9年），頁1。

註65 李眾軍，〈試論鄧小平軍事外交思想〉，《中共珠海市委黨校珠海市委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頁34。

註66 〈1998年中國的國防〉，<http://news.163.com/06/1228/18/33EUVQDQ0001252H.html>

註67 〈解放軍採取「請進來」聯訓〉，《文匯報》，2009年7月20日，版A11。



表四 2000年以來中外軍演觀摩和聯合軍演情況

時間	對象國	性質
2000.11	美國	邀請美軍事代表團觀摩軍事演習
2002.10	吉爾吉斯斯坦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3.5	美國、泰國和新加坡	派出觀察員觀摩「金色眼鏡蛇」演習
2003.8	俄羅斯	派出觀察員觀摩首長司令部演習
2003.8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聯合-2003」多邊反恐軍事演習
2003.8	15國27名軍事觀察員	邀請觀摩實兵軍事演習
2003.10	巴基斯坦	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3.11	印度	「海豚0311」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4.3	法國	海軍聯合軍事演習
2004.6	英國	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4.8	巴基斯坦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4.8	印度	邊防部隊聯合登山訓練
2004.9	多國軍事觀察員、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國際問題研討班學員	邀請觀摩「中國蛟龍-2004」兩棲登陸作戰演習
2004.9	16國軍事領導人、軍事觀察員、13國駐華武官	邀請觀摩「鐵拳-2004」實兵實彈演習
2004.10	澳洲	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5.8	俄羅斯	「和平使命-2005」聯合軍演
2005.9	24個周邊及西方主要國家的軍事觀察員和駐華武官	邀請觀摩北京軍區「北劍-2005」軍事演習
2005.11	巴基斯坦	「友誼-2005」海上搜救演習
2005.12	印度	「友誼-2005」海上搜救演習
2005.12	泰國	「友誼-2005」海上搜救演習
2006.9、11	美國	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6.9	塔吉克斯坦	「協作-2006」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6.12	巴基斯坦	「友誼-2006」聯合反恐演習
2007.2	巴基斯坦等國	「和平-2007」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2007.5	12個國家的15艘軍艦參加	第二屆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演習
2007.7	泰國	「突擊-2007」中泰聯合軍事訓練
2007.8	俄羅斯	「團結-2007」聯合軍事反恐演習
2007.8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和平使命-2007」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7.9	英國	中英「友誼-2007」海上聯合軍演
2007.9	35個國家的55名軍事觀察員	「勇士-2007」軍事演習
2007.9	法國	中法「友誼-2007」聯合海上軍事演習
2007.9	西班牙	中西「友誼-2007」聯合海上軍事演習
2007.9	澳洲和紐西蘭	三邊海上聯合演習
2007.12	印度	「攜手-2007」中印陸軍聯合反恐訓練
2008.7	泰國	「突擊-2008」中泰陸軍特種作戰分隊聯訓
2008.12	印度	「攜手-2008」中印陸軍聯合反恐訓練
2009.3	11國海軍參加	「和平-09」海上多國聯合演習
2009.6	加彭	「和平天使-2009」中加人道主義醫療救援聯合行動
2009.6	新加坡	「合作-2009」中新安保聯合訓練
2009.6	蒙古	「維和使命-2009」維和聯合訓練
2009.7	俄羅斯	「和平使命-2009」中俄聯合反恐軍演
2009.9	俄羅斯	「和平藍盾-2009」聯合演習
2010.7	巴基斯坦	「友誼-2010」中巴反恐聯合訓練
2010.9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和平使命-2010」上海合作反恐軍演
2010.10、11	泰國	「藍色突擊-2010」海軍陸戰隊混編同訓
2010.11	羅馬尼亞	「友誼行動-2010」陸軍山地部隊聯合訓練

資料來源：韓獻棟、金淳洙，〈中國軍事外交與新安全觀〉，《現代國際關係》，2008年第2期，頁52；〈中國海軍艦艇赴海外執行任務大事記〉，《長江日報》，2008年12月27日，版3；〈中印陸軍反恐聯合訓練無特定背景不針對第三方〉，《華僑報》，2008年12月6日，版24；〈中俄艦隊亞丁灣演練反海盜「和平藍盾-2009」演習將探索「上合組織」海上安全合作模式〉，《重慶晨報》，2009年9月18日，版17。〈海外練兵走出國門步伐越來越大從連級特種兵反恐到多兵種萬里投送跨國奔襲〉，《文匯報》，2011年1月7日，版A8-9；〈中國軍隊參加的28次主要中外聯合軍事演習〉，http://big5.showchina.org:81/gate/big5/www.chinaxinjiang.cn/zt2010/35/12/1/t20100916_650915.htm



空企業製造第四代飛機的相關知識；以色列提供了航空電子設備與空對空導彈科技相關援助；法國則幫助開發空對空和地對空導彈相關技術。【註69】

近年來，中共透過如參加東協區域論壇、上海合作組織國防部長會議、上海合作組織防務安全論壇、東北亞合作對話會、亞太多邊防務論壇等機制性的安全對話與合作，為中共官方、軍隊與世界各國展開安全對話、軍事合作，解決各國普遍面臨的各種安全威脅，乃至通過合作逐步解除恐怖主義威脅搭建起了堅實的平台。【註70】並通過雙邊、多邊聯合軍事演習，尤其是大型聯合軍事演習，可以檢驗一國軍力投送能力、各軍兵種之間戰略戰術協同能力，瞭解本國軍隊的短處及他國軍隊的長處，從而促進中共軍隊的新軍事變革，提高中共軍隊戰力。【註71】

其中有不少做法在中共軍事外交史上是第一次：第一次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習，第一次與俄羅斯商簽了在傳統安全領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備忘錄，第一次分別與英、法等西方國家及巴基斯坦、印度舉行了海上聯合搜救演習，第一次與巴基斯坦等中亞國家在高海拔地區舉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習，第一次組織外軍觀察員觀摩中共的軍事演習，第一次完成了海軍編隊環球航行等等（如表四所示）。【註72】

綜合言之，當前國際安全觀已發生改變，有別於以往傳統安全觀，「非傳統安全」是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逐漸突顯的概念，也因所涉及議題已非傳統主權國家可單獨解決，必須透過各國合作與協商的方式進行。進入21世紀，非軍事類安全威脅上升，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國反恐戰爭的衝擊，使這一概念的認同程度不斷提高，而且日益成為當前國際社會具關鍵特徵的意義。【註73】有鑑於此，中共對外的安全戰略也作了因應的調整，發展出與區域安全機制合作，處理相關安全議題的模式。並利用軍事外交與各國展開軍事交流，提升信任關係與促進區域穩定，如此符合中共當前對外政策穩定周邊促進發展的政策原則。

伍、中共對外的文化戰略與實踐

註68 王雨霏，〈新中國50年軍事外交的回顧與思考〉，《軍事歷史》，2000年第1期，頁30。

註69 Evan S. Medeiros, Roger Cliff, Keith Crane and James C. Mulvenon,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5), p. 1-50.

註70 徐目坤、耿超，〈當代中國軍事外交新特徵〉，《軍事歷史研究》，2009年第S1期，頁33。

註71 何奇松，〈中國軍事外交析論〉，《現代國際關係》，2008年第1期，頁54。

註72 熊賢培，〈中國周邊安全與和諧發展戰略研究〉，《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頁34。

註73 薛晨，〈非傳統安全問題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兼論「中國責任論」與和諧世界理念的實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3期，頁62。



近年來中共對文化戰略的重視與政策制定，主要來是國內外環境的改變，使得文化在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國際環境方面，冷戰結束後，國際發展已由以往強調軍事對抗之權力角度，轉而朝向以交流合作為特徵之國際格局。以往在冷戰時期兩極化的格局下，國際間主要權威來自於軍事實力或軍備上的優勢，如從現實主義的理論看，在有軍備差距的兩個國家中，軍備強的國家對軍備弱的國家有政治影響力，即具有國際威望。而且，各國間這種軍備強弱對比越懸殊，強軍備國對弱軍備國造成的心理壓力就越大，強國的政治影響力也就越大、國際威望就越高。^{【註74】}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歐盟興起，還有一些新興的經濟力量相繼崛起，世界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在新的形勢下，國際間實力的資源、性質與範圍也相應發生改變，軍事力量在解決國際爭端中的作用愈顯不力。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等非軍事的手段反而成為處理國際事務確保國家利益的有力手段。

其中文化因素更是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新趨勢，而文化對大戰略及國家行為能夠產生深刻影響在國家安全策略的研究中也已獲得共識。^{【註75】}較具代表性的如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以文化為視角，分析全球各文明間差異所可能引起的衝突；奈伊(Joseph S. Nye Jr.)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的概念，來解釋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的走向，以上兩種觀點皆是從文化出發來觀察後冷戰時期的國際走勢，進而提出對應策略；另外，建構主義也是以文化為視角，在冷戰結束後所發展出有別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新的國際關係理論。

根據建構主義的理論假設，文化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而且還影響國家的基本特徵，即所謂的國家的認同。文化的定位功能為確定對外政策提供了觀察世界及自身的視角；文化的定向功能決定了對外政策的價值追求；文化的規範功能為對外政策的選擇限定了範圍；文化的認同功能為對外政策中確定與別國的關係提供了文化基礎。^{【註76】}換言之，國際秩序的呈現為各國對國際社會的文化認同所產生互動的結果，而文化的認同即文化通過構建共有觀念或知識來塑造國家這一國際社會行為體的身份歸屬。因此，同質文化對於作為文化載體的民族和國家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並以其特有的親和功能使具有同質文化的國家在對外交往中加強合作或構築聯盟。^{【註77】}在建構主義的理論內容中，文化因素對一國在國際關係

註74 李智，〈試論文化外交對國家國際威望樹立的作用〉，《太平洋學報》，2005年第3期，頁71-72。

註75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Fall 2002), p. 87.

註76 尹朝暉，〈論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文化戰略〉，《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第27卷第4期(2009年8月)，頁134-135。

註77 孫紅霞、李愛華，〈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國際資料資訊》，2007年第6期，頁17。



的互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國內因素方面，自從1978年中共實施開放改革政策以來，經濟發展所帶來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共國際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2010年經濟體超過日本，目前僅次於美國在世界排名第二，而國際形象、責任、威望的提升，成為現階段中共對外關係的政策核心。文化對外的傳播，對提升一國國際形象、責任及威望具有正面的效果，文化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主要為：向國際社會製造和供給「共有(文化)觀念」，從而按有利於該國的方向引導和規範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塑造其國家偏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註78】}由於文化作為一種軟權力資源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也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所以國家形象越來越需要文化力量的支撐。面對當前的國際新形勢，中共必須發展和完善自身的文化外交戰略，進一步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工作，這樣才能讓自己的文化走向全世界，提升自身國際形象，進而讓世界接受，為中共發揮正面的國際影響力。^{【註79】}

此外，文化外交不僅為不同國家間的文化交流和對話搭建了一座橋樑，有助於增進彼此之間的溝通理解，化解相互間的文化衝突，而且還能通過對外文化傳播和交流，正確地影響和引導對方國家的輿論導向，化解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從而建構有利於自己的國家形象。^{【註80】}正如阿納德所指出的：「各種族與國家間無疑都受其文化間差異的影響，這些差異反映在他們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觀、利益、習慣、歷史期望和恐懼，之間的差異如果無法理解，就會導致誤解、扭曲並產生錯誤的判斷。」^{【註81】}

可以說，文化外交的意義在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預防性外交。它的主要功能不在於問題出來後才去做修補，而在於事前所做的鋪墊。譬如說，塑造國家形象，其根本是要調動對外關係中的情感因素，以至爭取政治盟友和合作夥伴。^{【註72】}近年來，中共已逐漸把文化外交納入到同經濟、政治外交並列的外交戰略總體佈局中來，並日趨走向理性、務實。^{【註83】}文化外交作為一種柔性的外交活動在一定程

註78 李智，〈文化軟權力化與中國對外傳播戰略〉，《理論與改革》，2010年第2期，頁108。

註79 喬旋，〈構建中國文化外交新戰略提升國家形象〉，《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5期，頁66。

註80 張殿軍，〈關於文化外交若干問題的探討〉，《天津行政學院學報》，第12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29。

註81 R. P. Anand, *Cultur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kti Malik: Abhinav Publication, 1981), p. 15.

註82 劉乃京，〈文化外交—國家意志的柔性傳播〉，《新視野》，2002年第3期，頁68。

註83 張殿軍，〈論和平發展征程中的中國文化外交〉，《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第11卷第3期(2010年5月)，頁34。



表五 世界主要語言-文化推廣機構的概況

機構	歷史至 2008年	性質	目的	海外分支 數目	年度經費估算及來源
法語聯盟	124年	與外交部有協議 的半官方機構	在全世界傳播法語，擴大法國 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	1100	約6億美元，政府撥款 約佔25%
歌德學院	89年	與外交部有協議 的半官方機構	促進海外德語教學，增進與各 國的文化交流	142	約4億美元，主要為政 府和公共基金投入
英國文化協 會	65年	隸屬外交部的半 官方機構	推廣對外英語教學，增進外國 對英國文化的瞭解	223	約6億美元，主要為政 府撥款
西班牙賽凡 提斯學院	17年	隸屬外交部的半 官方機構	在全球推廣西班牙語教學、研 究和使用，宣傳西班牙文化	60	約0.8億美元，主要為 政府撥款
孔子學院	4年	隸屬國家漢語國 際推廣領導小組 的非政府機構	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 的瞭解，促進多元文化發展， 構建和諧世界	305(包括 孔子課堂)	近年有較快增長，主要 為國家財政投入

資料來源：段奕，〈硬實力—軟實力理論框架下的語言—文化國際推廣與孔子學院〉，《復旦教育論壇》，第6卷第2期(2008年)，頁50。

度上填補了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的不足。文化外交觸發國際矛盾與衝突的概率較低，可以淡化政治和功利色彩，突破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造成的鴻溝，達到從文化親近走向政治親近和經濟合作。【註84】

當一個國家文化魅力的增強和對自身優秀文化的有效展示與傳播，才是更具深遠影響力的國家軟權力。在對外交往中，通過主流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更易深入人心；也只有在自己的核心價值觀被他國充分瞭解和接受的前提下，這個國家的對外形象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得以確立。【註85】並可提升國際上的「話語權」，所謂「話語權」，簡言之，就是說話權，就是控制輿論的權力。「話語權」掌握在誰的手裡，誰就能決定社會輿論的走向。在當代社會思潮中，「話語權」指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指一個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另從國際關係的觀點來看，「話語權」是指一個國家結合其硬權力和軟權力，通過指導國際事務、引導媒體輿論、影響外交政策、傳揚文化感染力，以達到在國際社會不同領域上成功說服的一種能力。【註86】

近代以文化為工具進行國力傳播，始於法國對外的法語教學。早在1883年，法國就成立了以在海外教授法語為主的法語培訓中心(也譯做法語聯盟)，在法屬殖

註84 邊葉宏，〈文化外交在國際外交戰略中的雙重效應及啟示〉，《理論前沿》，2009年第13期，頁28。

註85 〈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江西日報》，2010年8月30日，版B3。

註86 蔡國裕，〈中共企圖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5期(2010年5月)，頁10。



民地和世界各地教授法語。目前已在138個國家建有1098個分支機構，擁有30多萬名學員。每年3.75億歐元的預算和遍佈世界91個國家的144個文化中心構成了法國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外文化推廣體系。^{【註87】}20世紀30年代之後，各國都競相模仿法國的作法，用更隱蔽、更有滲透性的方法實現戰略目的(如表五所示)。^{【註88】}

如以文化外交最成功例子，美國當之無愧，為了在國際上推銷自己的形象，美國一直鼓勵以各種形式的接觸在他國培養「親美派」和「知美派」。它在國外設立「美國之家」，興辦美國大學，還通過各種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來傳播西方思想，如：富布賴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國際訪問者計畫、總統國際青年交流倡議，這些計畫旨在通過人與人的直接接觸，加強和促進他國與美國人民之間的互相瞭解。此外，還通過政府間的藝術表演和美術交流，樹立美國的形象，寓宣傳於藝術交流之中；通過圖書出版和英語教學，擴大美國文化在國外的影響，^{【註89】}美國文化的有效傳播，無形中也營造出有利於美國世界治理的文化客觀環境。

另外，美國也是世界上傳媒最發達的國家，它利用遍佈世界的新聞傳播網路，構建話語強權。這套話語傳播體系通過種種途徑，滲透到了世界上許多的國家和地區，通過輿論、資訊的控制和傳播體系進行強勢的文化滲透。美國成立「全球資訊辦公室」，整合對外宣傳力量。美國媒體發佈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發佈資訊總量的100倍，控制著世界75%電視節目的生產與製作。目前，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通過衛星電視向全世界137個國家和地區傳送晝夜新聞節目。美政府海外電臺的「美國之音」，能使用包括英語在內的52種語言廣播，每週擁有世界各地約8600萬聽眾。此外，美國在100多個國家設立了200多個新聞處和2000多個宣傳活動點，在80多個國家建立了圖書館，不遺餘力地擴大其思想文化影響。^{【註90】}

除利用報刊、廣播和電視傳統媒體之外，西方國家還利用所謂「第四媒體」——網際網路，進一步增強西方文化滲透和入侵的能力。據統計，現在網際網路上的內容，英語約佔95%，法語約佔3%，世界上其它眾多的不同語系只佔2%，其中，網際網路上的中文資訊僅佔1%。^{【註91】}縱觀世界各國文化市場中的份額，美國佔43%，歐盟佔34%，亞太地區佔19%，日本佔10%，南韓佔5%，而中國大陸和其他亞太地區只佔4%。美國的影視和圖書出版等總收入是600多億美元，美國還控制了世界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製作，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電視節目有60%-80%的欄目來自美國

註87 〈全球邁入「文化外交」時代〉，《北京商報》，2011年1月24日，版A4。

註88 胡榮榮，〈話語權與文化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年第5期，頁66。

註89 劉乃京，〈文化外交——國家意志的柔性傳播〉，頁67。

註90 趙桂生，〈安全環境新變化與國防經濟發展戰略〉，《軍事經濟研究》，2010年第12期，頁13。

註91 胡惠林，《中國國家文化安全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01。



。【註92】

中國大陸「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依據世界各國的各項指標數據，研究、評比各國的文化影響力指數之排名，得出如下結果：「中共的文化影響力指數，在全世界排名第七，居於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之後。」

【註93】從以上的數據可顯示出，中共的文化影響力，在世界所佔的比例是多麼微不足道。正如英國前首相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曾經指出：「中共沒有那種可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從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國際傳染性的學說。今天中國大陸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註94】

在國際局勢發展及自身文化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共已體認到，當代世界，安全環境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國防安全，更多的時候體現的是一種綜合性，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網路的安全等，不一而足。而「文化安全」【註95】威脅卻是以上種種安全威脅中最致命的威脅，特別是美國的文化產品及思想傳播，已經對自身構成嚴峻挑戰。直接促使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共在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中，如何重建中國文明，界定中國文明自身的精神特質及恢復自身的思想能力中，重新開始思考如何重建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觀念，創造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並思考自身與世界，思考自身的前途、未來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責任。【註96】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註97】2002年11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文化建設要立足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著眼於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長處，在內容和形式上積極創新，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收力和感召力。」【註98】2005年10月，中共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中提出：「

註92 張志勇、司春霞，〈關於提升文化軟實力戰略的思考〉，《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1期(2011年2月)，頁42。

註93 蔡國裕，〈中共企圖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之研析〉，頁11。

註94 蔡國裕，〈孔子雕像鄰立天安門廣場之文化與政治意涵〉，《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2期(2011年2月)，頁34。

註95 文化安全指一個國家文化主權獨立，在遭受外來文化的侵蝕、破壞和顛覆時，能很好地保護本國人民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行為方式及評判標準等不被重塑、同化，保護文化的民族性，維護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並利用必要的手段擴大本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楊世生、張育賢，〈維護中國文化安全的戰略思考〉，《湖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0卷第5期(2010年10月)，頁33。

註96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2。

註97 陳庚，〈國家文化創新戰略確立的歷史邏輯與價值意義〉，《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30卷第1期(2011年2月)，頁32。



加快實施文化產品「走出去」戰略，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註99】}2006年9月，文化建設十一五規劃指出：「堅持文化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實施文化創新戰略；實施“文化創新工程”，推進舞臺技術進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始終把文化創新作為文化發展的戰略基點和前進動力；文化創新，包括繁榮發展文學藝術、培育文化創意群體和內容提供者、推動文化企業成為文化創新主體、加快科技創新、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註100】}

2007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力，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註101】}2009年7月，中共國務院原則通過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規劃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跨區域重組的振興任務。首次提出允許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文化產業。^{【註102】}2010年3月5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力量，更需要強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註103】}中共近年來一系列有關文化觀點官方文件的提出，顯現出中共對此議題的重視。其主要作為如下：

首先，為了提升中共的國際形象，近年來，極力推動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一詞，係由位於美國波士頓(Boston)塔芙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前院長愛德蒙·古連(Edmund Gullion)於1965年時提出，但其定義眾說紛紜。簡單而言，公共外交是一國政府影響他國民眾或菁英分子意見的作為，目的在轉化目標國家的政策對本國有利。^{【註104】}

公共外交對中共而言是較新的觀念。2001年10月，時任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的趙啟正在「全國人大對外宣傳會議」上表示，為了取得良好的國際公眾輿

註98 中央文 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30。

註99 中央文 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033。

註100 陳庚，〈國家文化創新戰略確立的歷史邏輯與價值意義〉，頁33。

註101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中國共產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3。

註102 朱虹，〈文化外交折射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新東方》，2010年第5期，頁69。

註103 鄧清柯，〈文化是一個國家的命根子——論文化立國的戰略價值與意義〉，《湖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頁130。

註104 胡聲平，〈大陸公共外交的內涵、特色與發展〉，《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頁18。



論，必須從現在起更加明確做好公眾外交工作，這是中共官方首次使用公共外交之概念。2009年7月20日大陸舉行的第11次駐外使節會議中，胡錦濤正式使用公共外交一詞，他在對今後中共外交工作方向提出指示時，強調要「要加強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開展各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扎實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在胡錦濤要求加強公共外交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政府已將公共外交列為重點工作。【註105】

中共推動公共外交主要採取3項策略：1. 建立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2. 大力開展對外交流，積極傳播中華文化；3. 加強對外宣傳，努力掌握國際輿論話語權。其中第2項即是配合文化外交加以開展，而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文化外交亦是軟權力的運用；第3項則是掌握國際發言權，與中共使用的國際宣傳媒體及其建設有關。【註106】

其次，增設駐外中國文化中心。增設中國駐外文化中心，是為適應中國文化走出去，活躍中國文化外交的需要而實施的一項創新性舉措。繼1988年7月和9月，中共首批駐外中國文化中心分別在非洲的模里西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Mauritius) 和貝南共和國 (La R publique du B nin) 建成並對外開放後，又先後在法國、南韓、日本、埃及等多個國家建設了中國文化中心。中共駐外文化中心正逐步成為中共最為權威的海外文化傳播平臺。【註107】目前，中共已批准在海外建立15個中國文化中心，把中國文化高頻率、不間斷地送到駐在國民眾的家門口；此外，已有100多個國家的2000多所大學開設了漢語課。在中國大陸的外國留學生過去10年間由3.6萬增長到11萬。根據國家教育部的統計，從1978年到2008年10月，中共累計接受來自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籍學生123萬人次。近年來，外國來華留學生年均增幅超過20%。【註108】

第三，舉辦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年實質上就是中共對外交流新機制實施的一個縮影。其活動主要由中共文化部負責組織，科技部、教育部、國家民委、國務院新聞辦、國家廣電總局、國家體育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國家旅遊局、國家文物局、中國對外友協、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全國婦聯等多個部委和全國性人民團體共同參與舉辦，並成為加強與友好城市之間交流的重要手段。【註109】這些對外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動，既能擴大世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溝通與理解，也有利於中共文化外

註105 胡聲平，〈大陸公共外交的內涵、特色與發展〉，頁17-18。

註106 胡聲平，〈大陸公共外交的內涵、特色與發展〉，頁19。

註107 張殿軍，〈論和平發展征程中的中國文化外交〉，頁35。

註108 趙卓莉，〈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戰略意義及路徑選擇〉，《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總第66期（2009年11月），頁67。

註109 李志斐、于海峰，〈試論「中國文化年」現象〉，《理論界》，2007年第2期，頁111。



交戰略目標的實現。

近年來，中共與不同國家開展形式多樣的國際文化周、文化年活動。舉辦文化年、文化周，是提高一個國家文化軟權力影響的重要依託。^{【註110】}如法國「中國文化年」（2003-2005年）、英國「中國文化年」（2003-2004年）、俄國「中國文化節」（2003-2004年）、愛爾蘭「中國文化節」（2004年）、荷蘭阿姆斯特丹「中國藝術節」（2005年）、美國「中國文化節」（2005年）活動，從2006年開始，中國-俄羅斯「國家年」、「中印文化年」、德國漢堡「中國文化節」、義大利羅馬「中國文化節」也陸續拉開帷幕。^{【註111】}

最後，孔子學院的成立，近年來，海外孔子學院和國際漢語教育發展取得的豐碩成果與其制度建設密不可分。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於加強漢語國際推廣工作若干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6〕17號）頒發實施；2007年，孔子學院實行總部理事會議事決策制度；2008年，推出《國際漢語教師標準》《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和《國際漢語教學通用大綱》，為國際漢語教育提供品質標準。2009年，網路孔子學院上線，構建了國際漢語教育的遠端教學與開放式學習體系。設立孔子學院獎學金制度，為外國漢語教師來華研修、攻讀學位提供資助。在此基礎上，《孔子學院章程》規定了全新的“因地制宜”合作方式，旨在建設不同類型與功能的孔子學院及孔子課堂，形成輻射作用的國際漢語教育骨幹體系。^{【註112】}

從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正式在南韓首都首爾掛牌成立起，截至2010年10月，各國已建立322所孔子學院和369個孔子課堂，共計691所，分佈在96個國家（地區）。孔子學院設在91國（地區）共322所，其中，亞洲30國（地區）81所，非洲16國21所，歐洲31國105所，美洲12國103所，大洋洲2國12所。孔子課堂設在34國共369個（緬甸、馬里、巴哈馬、突尼斯、坦桑尼亞只有課堂，沒有學院），其中，亞洲11國31個，非洲5國5個，歐洲10國82個，美洲6國240個，大洋洲2國11個。^{【註113】}由此可見，孔子學院的發展快速，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各國民眾對中國文化和漢語學習的需要。漢辦的目標是到2020年在全球設立1,000所孔子學院。

^{【註114】}

註110 張殿軍，〈論和平發展征程中的中國文化外交〉，頁35。

註111 李志斐、于海峰，〈試論「中國文化年」現象〉，頁109。

註112 袁禮，〈試論孔子學院和國際漢語教育的制度化建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76-77。

註113 孔子學院總部網站，<http://www.hanban.edu.cn/>

註114 〈現代中國+全球化孔子「環遊」世界中國展現軟實力〉，《文匯報》，2010年11月10日，版A27。



陸、結論

近年來，中共在國際上的表現已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如科蘭滋克 (Joshua Kurlantzick) 在2007年以《魅力攻勢：中共的軟權力如何改變這個世界》為名，著書描述中共憑藉其軟權力所發揮的全球影響力。^{【註115】} 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則提出「北京共識」 (Beijing Consensus) 這個概念，指出「……中國模式，已開始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方面改變整個國際發展格局」；相較於繼續倡導旨在保護其自身利益之單邊政策的美國，中共已在許多國際事務領域上削弱美國的影響力。^{【註116】}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對中共的觀察，並非只以傳統西方權力政治的視角作分析，反而在多方面對中國傳統戰略文化觀進行觀察，試圖從中尋找中共未來發展的軌跡。而近年來，中共對外政策的論述，似乎也喜歡引藉傳統中國戰略文化的觀點來作理論鋪成，「和諧世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胡錦濤指出：「中國人早就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嚮往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註117】} 加以如前文所分析中共對外不論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戰略，皆看得到傳統中國戰略文化的影子，其執行成果也已經廣泛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可以推斷，中國戰略文化，將是分析未來中共的對外政策的重要視角。

作者簡介

助理教授 李明正

學歷：空軍官校67期、政戰學校政治學碩士、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經歷：空軍官校軍學部教官、空軍官校社科組專任助理教授，現職：大仁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註115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116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p. 3.

註117 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解放軍報》，2006年4月23日。